

文化主位的建构主义:灾害社会调查的范式、伦理和方法

刘红旭^{1,2},胡荣¹

(1.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2.西藏民族学院社会学教研室,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灾害社会调查是社会学者进入灾区,根据研究设计搜集研究资料的过程,也是研究者参与灾害社会事实建构的过程。从被研究对象的视角即文化主位的姿态,整合建构主义的相对主义本体论和主观认识论,形成文化主位的建构主义范式。从研究方法而言,文化主位承接了源自灾民的思想感情和话语,建构主义则有助于发现灾害社会事实构造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意义。从伦理操守而言,研究者恪守客观中立与人文关怀并重的规则,就是从受灾者的视角秉持同理共情,又坚守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底线。

关键词:文化主位;建构主义范式;灾害社会调查;伦理规则;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C 91-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0X(2014)03-0107-07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灾害防治和救助的历史源远流长。据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办公室发布消息称,2012年,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2.9亿人次受灾,1338人死亡(包含森林火灾死亡13人),192人失踪,1109.6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农作物受灾面积2496.2万公顷,其中绝收182.6万公顷;房屋倒塌90.6万间,严重损坏145.5万间,一般损坏282.4万间;直接经济损失4185.5亿元^[1]。自然灾害现场,不仅需要自然科学者在监测、救助、评估方面有所突破,而且需要在社会工作者、心理学者业已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给予足够的关注。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由于在灾害中常规社会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正好为社会学家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变化过程的‘自然实验室’,为他们深入理解社会运行、发展社会理论提供了良机。”^[2]然而,与灾害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中,

我国的灾害社会学研究起步较晚,还处在发展和探索阶段,并面临着一些亟需破解的难题。一方面,1978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全面学习美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而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学,在问题意识和理论、技术方面存在无法克服的两个悖论,窒息了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也逐渐滑向布迪厄所嘲笑的“社会巫术”(social magic)的泥淖^[3]。验证欧美学者中层理论的热情远胜于总结中国经验,本土文化传统上的理论反思几近阙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来,中国正快马加鞭奔走在现代化之路上,除了1998年南方大水之外,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过影响全国的重大自然灾害,媒体对地方性灾害的报道也十分有限。既非重要议题,又无紧急需求,灾害社会学这支未雨绸缪、色彩浓厚的分支学科,就无法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也在情理之中。虽早在1998年王子平先生就出版了《灾害社会学》,但总是鲜有登高一呼的领跑者,步履艰缓在所难免。直到2008年

收稿日期 2014-02-08

作者简介:刘红旭,厦门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西藏民族学院讲师,从事民间信仰与村庄治理、灾害社会学研究;胡荣,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学理论、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研究。

汶川大地震,惊醒了疏于自然灾害防治的中国,血淋淋的生命代价给中国留下太多需要总结和反思的东西。举国体制救灾的优越性得到了一定程度体现,因灾而起的强大社会力量,救同胞于危难,彰显了社会道义。参与救援和重建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灾害伦理与人文关怀、应急反应与制度建设、社会工作与心理疏导。与此同时,灾害社会学的相关议题,随着救灾的进程开始酝酿和设计,一大批好的研究成果陆续面世。

灾害现场是一个特殊的研究场景,田野调查者无法将自己从社会事实参与建构者的身份中完全抽离,而且需要面对难以挣脱的情感性因素。身份既是藩篱也是认同根源,话语既是交互工具也在表达情感。恪守科学规范的社会事实挖掘者,抱持人文关怀的救灾志愿者,记录见闻与理论思考的扎根理论实践者,都是灾害社会学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同时兼任的身份。研究者已有的学术训练和理论视野,是灾害田野调查取材选景的框尺,也是作为人本意义上与灾民同理共情的被研究者,占据的时空因素高度重合,参与了灾害事实的建构。我们认为,文化主位的建构主义范式,保证了研究者更加开阔的视野,并通过承接源自灾区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话语,发现灾害社会事实构造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意义。人文关怀与客观中立的伦理准则,研因制宜的方法选择,都指向于灾害社会学知识的生产,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置于相同情景的通感共鸣,反身向外的独立思考,让学术研究迈向人本意义上的良性互动之路。

一、文化主位的建构主义范式

范式(paradigm)是指“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4]。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5]显然,范式更加具有专业的特性,“它突出地体现在科学共同体对事物共同的认识观、科学共同体所从事“专业”的知识体系和范例以及科学共同体开展研究活动时所遵从的各种规范等。”^[6]受范式概念影响,社会学家总结了本学科传统理论范式。瑞泽尔在1975年出版的《社会学:一门多元范式的科学》中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有着重大区别的科学,社会学是一门具有

多元范式的科学。社会学中的三种基本范式分别是: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行动范式^[7]。古芭和林肯的类型学基于社会学又延伸至行为和社会科学,包括: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8](P109)。

社会学实证精神肇始于孔德,实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现象认识和解释理论即为社会学。社会学传统理论范式取向虽有不同倚重,然而实证主义的幽灵从来没有离开过社会学视域,实证主义的批判也成为当代社会学方法论转向的起点。作为与孔德意义上最高层级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秩序的对应,“‘实证’一词尚未直接表示的新哲学精神的唯一特性,它包括了到处由相对代替绝对的必然倾向。”^[9]韦伯为代表的理解社会学是经典社会学另一个传统,以人文主义取向著称。其基本观点是,既然社会学研究的是有感情的人和变动不居的人类社会,它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质上不同,那么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学问题,对行动者理解自然成为首要选择。随着社会学研究中心从欧洲移向美国,实证主义更是跃居翘楚,成为社会学研究范式独一无二的霸主。社会学传入美国之后,实用主义土壤上生长的美国社会学,产生了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宏大理论,展现了实证主义所向披靡的理论野心;也产生了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为代表的社会学科学主义,借助于精准的数据分析和模型,追求社会学知识科学化途径。美国社会学称霸世界的结果,就是将实证主义推向终极,成为社会学独领风骚的范式。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的产生,意在打破实证主义构筑的铜墙铁壁,寻求新的不同的诠释进路。

作为实证主义的反对者,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都不同意实证主义的理论预设和方法取向,质疑社会学一直奉为圭臬的现实,更加重视行动与意义、话语和实践。这三种新的方法论范式,针对实证主义的禁锢采取了不同的突围路径,各有其长,但有着明显的一致性。“这三种范式都注重在自然情景而不是人为的实验环境下进行研究,都强调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的探究,而不是对其中一些孤立的变量进行调查;都要求对当事人的意义建构获得理性解释性的理解,而不只是对他们可观察到的外显行为进行测量,也不只是对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假设进行证实;都注意反思研究者个人因素对研究过程及结果的影响,而不是力图排除或否认这些影响。”^[10]其中,建构主义牢牢抓住社会事实建构大于存在的

命脉,从实证主义者笃信的科学生产过程,发现“包括科学理论在内的一切知识的内容归根结底都由社会、文化因素的参与和作用而形成。”^[11]这样一来,建构主义就斩断了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合法性根源,挖出了公认的客观科学知识背后的主观建构痕迹,再扩展到不言而喻的社会领域,建构主义完成了崭新的形象塑造,成为解释力很强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社会本质建构的论调,颠覆了追寻隐于表象背后真实的方法承诺。正如德里达在解构传统戏剧的过程中提出,我们不用借过去来发现未来,也不应该顺从地等待自己命运的展现。实际上,在我正在进行的事情中未来已经被发现、被创造出来。我们现在即处于写作未来的过程中,但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未来会是怎样^[12]。

从字面意思而言,“建构主义这个词是指一种替代性的范式,其叛逆性的设想就是舍弃本体论现实主义而转向本体论相对主义”^[13]。从本体论而言,建构主义倾向于相对主义,消解了社会科学研究中自然科学思维的压力,有利于诉诸适合于特定情景中的特定研究对象。从认识论而言,建构主义坚持的主观论,即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不可分割,研究结果具有创造性,恰当迎合了文化主位的操作规程,也符合实地研究的技术要求。从研究方法而言,建构主义采用质性研究,容许研究者敞开视野,不拘于研究假设和数据模型的约束,有利于深描社会事实。从推演逻辑而言,建构主义青睐于归纳,纵然研究者不可能完全抛弃已有的理论惯性,但是扎根理论的研究理路,主要仰仗于经验事实到理论的归纳过程。从因果联系而言,建构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会同时相互依存,不可能区分原因与结果”^[13],现实环境中,客观事物之间以时间先后次序与逻辑相互决定来区分因果是没有问题的,但也不能忽略主观色彩浓重的社会事实之间互为因果的情况,后者甚至更加符合社会生活的逻辑。因此,我们选择建构主义方法论/范式,契合研究者对于社会认知的出发点——社会蕴含着无限可能性,以及对突发自然灾害场景中复杂社会的判断,田野调查也证实了建构主义可以作为认识灾害社会事实的一条适宜路径。

语言学家肯尼思·派克(Kenneth L. Pike)1954年在《人类行为结构统一理论中的语言》(《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中创造了两个新词“主位”(emic)与“客位”(etic),分别源自词语“音位的”(phonemic)和“语音的”(phonetic)^[14]。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主位陈述更多涉及逻辑—经验体系,参与者通过对事物重要性、意义、真实性、正确性或其他方面是否适宜于他们的对比与辨异发现区别。客位陈述有赖于进行科学研究的观察者群对可观察的区别做出适当与否的判断^[15]。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分别表示从被研究者和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文化主位的研究方式即“对质的研究者从事研究的具体实践进行描述和总结,而不是按照一种外在的衡量标准对其进行概念上的抽象和概括。”^[16]文化主位表达了研究者进入田野的取材姿态——从研究对象而来,又能回归到研究对象那里去。语言和风俗习惯,知识体系和分类系统,思维定势和概念建构,文化主位需要的地方性知识——像研究对象那样思考和行动,对研究者而言应当是不言自明的前提。当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本身在研究关系中的边界,不能因文化主位的取向而模糊甚至重合,他者的想象与独立的思考,是不可分割的两面。

文化主位的建构主义范式,申明了研究者经验材料取舍的原则,表明研究的过程性与反思性。社会理论洞察力的蓄养和延展有赖于经验研究,而数据资料制造的过程,是将不完整的杂乱现实素材,整理成逻辑鲜明、思路清晰的社会生活路线图。文化主位的立场,既是研究者开掘本身的地方性知识服务于研究,也是灾害现场扎根社会生活吸取养分的策略。建构主义的范式,鼓动研究者开放的取材尺度,既关注个体生命的鲜活故事,也关注灾害现场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动员,也关注不同行动主体的互动过程和结果。如果说“社会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其目的是为了给其他理论化形式所忽略的问题提供一个表现形式或者研究日程”^[17],那么经验研究过程就是反思理论和方法,捕捉转瞬即逝的灵感,连缀琐碎的生活片段,从命题归纳回到社会理论的构造。

二、灾害社会调查伦理规则

灾害现场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破碎社会,弥漫着人本意义上的伤痛。置身其中的人们,无论籍贯、年龄、性别、身份等外在因素,都要或多或少受染于那种特殊的悲怆气氛。本能上力所能及的同胞之情随处可见,点滴关怀引发的感动会迅速传播——让受助者、施助者和旁观者都泪水涟涟。迫于急切生存压力的自私贪念会肆意鼓胀,误解和谣言的蛛丝马迹都会顷刻织成一张大网,覆盖四处,引发过激的社会

情绪。可以说,灾害尚未退去的阴影让灾区周遭笼罩着恐惧,敏感成为人们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对于行走于灾区的研究者而言,人文关怀与价值中立同等重要,宁可不帮忙、绝对不添乱的基本原则亦需恪守。

社会因人而存在,社会学研究者本身即是社会的组成元素,人与社会的关系始终困扰着社会学,又赋予社会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品质。为了剥离研究者可能不由自主倾注在社会事实上的感情,韦伯提出“价值中立”的戒律以匡正社会学规范化的研究路径。因为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本质上的差异,韦伯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过于复杂(他将其分类为传统行为、感情行为、目的理性行为和附带行为),不可能用传统自然科学的方式加以研究,这也成为社会学深陷科学主义泥淖之后,反身向外重新回归人本的渊源。价值中立并非研究者绝对放弃价值判断,而是研究者遵循实然陈述的原则:通过经验科学研究告诉人们事实是什么,而不谈应该是什么。全球化带来的权力、资本和文化侵入,让学术研究者从选题到研究结果,难免沾染强势话语的感情色彩,客观中立愈加成为社会科学矢志不渝的准绳。

灾害社会学田野调查可以选择的两种途径,跟随政府的调研或研究者只身田野调查,都会因为相近的言说者而难保独立:或倚重于政府积极的救灾过程,大量笔墨花费在介绍政府救灾程序和规划上,顺从于政府思维的写作,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或倚重于灾民生活状态的叙述,过于沉溺于个体苦难的呐喊,甚至产生误解政府行为而言辞激烈,无益于学术研究价值体现,亦不能解决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田野调查旨在获得一手资料,用学科视野发现问题形成理论,至于是否会引起政府注意进而有相关政策出台,是研究者无力企及的,研究者更不能在访谈中许诺任何可能的结果。然而,灾害社会学的场景中,研究者本身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又会以学术论文或专著公开研究资料,这些都会给访谈对象一种希望。梦想成真,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价值,完成一次经世济民的抱负,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奠定好的基础。但这样原本只是一个自我建构的希望,实现的可能性不在研究者的掌控之内,由此导致的失望岂是研究者的过错,后来的研究者却又将如何进场?这样进退两难的困境,给学术研究伦理提出一个严峻的议题。

人文关怀可以简单理解为出于对生命的尊重而关怀每一个个体,无论贫贱富裕,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健康残疾。灾害社会学的田野点,灾害中生命财产

损失的灾民是一个需要关怀的群体,人本立场的真诚沟通最为可贵。灾民访谈随处都是“雷区”,任何一个看似平常的问题都有可能牵涉悲情,由此带来访谈对象情绪的低落肯定是研究者不愿意看到的。一旦遇到这种情况,研究者问题导向的访谈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聆听和安慰,甚至短时间的沉默,学术研究让渡于人文关怀,这是起码的举措。灾害现场谨小慎微,体现着学术研究者对于生命的尊重和关怀,研究的过程也是温情流动的过程。如若执著于资料收集而忘乎研究的根本意义,乃是朝向美好社会的知识生产和理想追求,便已经将丰富的科学价值简化为功利化的工具理性。行走于灾害过后的田野,研究者要祛除猎奇与虚荣的心理,以浸含着学术良知的行为方式,散发出人性光芒,完成灾害调查与人文关怀的双重任务。

三、灾害社会调查方法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后实证主义,同样坚持实证主义关于客观现实可以认知的前提,却采取了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即现实世界的认知不可能穷尽真相,充其量只是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可以用库恩提出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概念总结,即“逻辑上可能的理论与经验材料并不一定相符合,因此,经验证据无法确定理论是否正确。”^[18]灾害现场散落着破碎的社会生活,理论链条重新组合的过程,是否具有库恩所谓的不可共量性,对初入田野的研究者而言是未知的。但是,实地研究者进入田野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综合运用专业训练习得的方法工具,发现理论的阳光不曾照到的暗角,发现杂乱无章的事实背后连缀的逻辑主线。现象学社会学家舒茨所标定生活世界认识旨趣,成为我们自我勉励的身份认同:悉心观察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生活世界,并跃迁到一个与日常生活的“至尊现实”迥异的现实秩序中,成为超然的观察者。

灾害社会学田野调查需要考虑时效性,转瞬即逝的场景只有研究者亲身体会,才能理解灾民安置和重建中出现问题的来龙去脉。如果带着理论假设进入田野,目的明确收集资料会十分高效,但是突发自然灾害下做田野调查很难具备成型的理论指导,研究者只能遵循扎根理论的路径,敞开视野接收各种人物和事件。观察、访谈、整理资料、阅读文献都是蓄养理论生长点的时机,资料积累和冥思苦想之后

的顿悟,任何时点和地点都有可能迸发出来。社会研究方法是一个开放体系,人类社会变动不居的特点和感情世界丰富多变的人类,都使得充当丈量尺度的社会研究方法必须因地制宜。对于中国社会调查而言,认识到“作为中国社会调查前提的理论必须充分肯定主观性、特殊性和情感体验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如此,这种理论才能作为中国社会调查的前提,指导调查选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课题、假设、概念框架和指标系统”^[19]。

突发自然灾害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从拟剧论观点来看,是角色扮演各方同一时间集中登场,各自怀揣目的“演出”的过程。期间发生的每一个事例,都与历史记忆互相关联,只不过特定情境赋予更加丰富的内容。既然在救灾的“舞台”上,从灾害的标签之时起,就面临不同主体的主观建构,救灾重建便是在各方协商博弈中“共谋”的结果。身临现场,社会学研究者要从底层视角记录历史,从官方历史话语权力忽略的民间记忆中重述历史,建构知识。从历史的亲历者——芸芸众生各自生活经验感知出发,不再局限于标志性事件和人物,而是历史的主体建构出的丰富鲜活的过往。正如有学者认为“口述史是一个人的生平阅历、历史经验和感情世界的记录,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的生动记录”^[20],我们所要聆听的正是灾民述说苦难、憧憬未来的话语,但在分析时则汇聚在当下的生活实践中,口述史的意义也就不再被框定。

实地研究是一种由人类学者应用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研究方法,是一种能给研究者提供系统的观点,要求“实地研究者很少带着需要加以检验的、已明确定义的假设”^[21](P276)。洛夫兰夫妇(John and Lyn Lofland)在其著作《社会情景分析》(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讨论了几种适合实地研究的社会生活因素,其中列举的有实践、情节、邂逅、角色、关系、群体、组织、聚落、社会世界和生活形态或亚文化^[21](P276-277)。灾害现场的实地研究,就是要跟随理论范式的指引,又不拘泥于某个理论或事件左右,综合采摘田野点散落的角色扮演与情节、群体实践与个体故事。灾害的社会性表明,灾害发生的根源、导火索、灾情,以及救援与重建的过程,都不再着眼于气象、地质条件等自然因素,而是掺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因素。灾害的述说,建立在经历者深刻的记忆里,却要经过长时间、多维度、高频率互动,才能逐渐出现一个“社会”认同的灾害事实。从这个角度讲,灾害事实的话语体系,是经历者、聆听者与传播者共同缔

造的过程。关于灾害的话语呈现方式,也会因为各种机缘和有意无意的设计,以相对合理的图像面世。如果我们简单认为,凡是镌刻着人类生产生活痕迹的产品,就是文化。那么,灾害话语是一个内容丰富、鲜活流动的文化体系。而且,所有参与了文化的生产者,会自然而然把他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的身份和权力随之加入其中,不平等甚至霸权也并非不可能。

文化主位的建构主义范式“注视”下,我们以个案深度访谈法为例,探讨灾害社会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具体方法技术。深度个案访谈实质上是“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一场持续深入的对话,这种亲密的接触,使研究者的领悟与观察访谈所获得生活信息处于不停顿的交流之中”^[22],研究者在事先不拟定任何确定问题和提问程序的情况下,围绕自己的研究目的,努力捕捉时机,有针对性地把问题引向深入,因此而获得“原汁原味”的资料。如果说质性的实地研究是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灾害社会这一系统,个案深度访谈则是要分别通过与灾民、志愿者、政府管理人员、媒体等灾害现场的行动者“对话”,从互动中采集不同角色扮演者镶嵌在救灾和重建过程中的面向,得到更加具体的信息;在个案合理扩展的范围内,提供突发自然灾害处置可资借鉴的社会学程序。抽象而难以直接证实或证伪的元理论,试图将所有的人类社会生活行为纳入其理论框架。中层理论的组成元素可以借助操作化接受经验材料验证,完成理论的修补,提高解释水平。经验理论采集于日常生活,以命题或概念形式表达,更多停留在具体经验的意义之上。

四、灾害调查与灾害社会学

灾害现象的发生发展,虽有古今时间差异,亦有中外空间差异,但未雨绸缪的灾害预案、组织得当的灾害救援和人文关怀的灾后重建,具有普遍的一致性。并且,现代国家都普遍重视经历了灾害实践的宝贵经验——高度组织化的救援方式。正如克兰特利教授所言,“无论什么地方,灾害防御和应对的核心是组织。……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社会特征,与发达国家的高度组织化的机构一样,可以发挥(减灾的)功能”^[23]。同样是面对各种灾害的影响,以美国学者为主的灾害社会科学研究远走于世界之前列,让中国学界望尘莫及。1963年,成立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后又随发起人之一恩里克·克兰特利(Enrico L. Quarantelli)迁至特拉华大学的灾害研究中心(Dis-

aster Research Center, 简称 DRC), 至今仍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灾害研究中心^[24]。1976年成立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自然灾害中心(The Natural Hazards Center, 简称 NHC)是美国另一个灾害研究重镇, 该中心旨在成为一个关于灾害政策与社会科学的全国及国际交流中心, 主办灾害研究领域两个有影响力的期刊《自然灾害观察》(Natural Hazards Observer)和《自然灾害研究》(Disaster Research), 蒂尔尼教授(K. J. Tierney)为中心主任^[25]。

如同其他学科一样, 学习国外同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灾害社会科学研究^①, 有助于我们理清灾害研究的学术脉络。同样重要的是,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救灾经验中吸取养分^②。当然, 当前中国灾害场景中的灾害社会学研究, 当务之急在于从适宜的方法入手, 进行中国经验的知识生产。不同于哲学思辨的特性, 也不同于人类学专于叙事的笔法, 社会学既要求完整的情节佐证, 又要求社会学想象力基础上的理论思考^[26]。我们认为,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 利用突发自然灾害的场域, 运用扎根理论的路径深入田野, 通过研究政府、社会力量和灾民各自在救灾和重建中的角色扮演、互动关系和制度实践, 是灾害社会学的主要议题。灾害社会调查, 是社会研究方法在特殊场景的灵活运用, 贯注着研究者洞察社会事实的能力, 显现着研究者理论关怀与伦理操守, 需要每一位进入田野的调查者在实践中反思, 反思中学习, 从而形成一条适合中国灾害社会学的社会研究路子。

注:

① 2002年10月, 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办的灾害大会上, 克兰特利教授发表了题为《a Half Century of Social Science Disaster Research: Selected Major Findings and Their Applicability》的演说, 总结了195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灾害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及其应用价值。

② 中国救灾史的研究方面, 国内有多篇博士论文已做了出色的研究。比如: 段伟《秦汉社会防灾减灾制度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论文, 2005年; 吴艳敏《民国时期社会救灾研究》, 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论文, 2006年; 鞠明库《灾害与明代政治》, 华中师范大学专门史专业博士论文, 2008年; 蒋积伟《1978年以来中国防灾减灾工作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博士论文, 2009年。

参考文献:

[1] 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办公室. 权威发布 2012年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EB/OL]. 民政部国家减灾委办公室网 <http://www.mca.gov.cn/article/zrzh/201212/index.htm#>, 2013-01-06.

- [2] 赵延东. 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J]. 社会学研究, 2007, (5).
- [3] 沈原. “强干预”与“弱干预”: 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J]. 社会学研究, 2006, (5).
- [4]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second edition)[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0. 175.
- [5] [美]托马斯·库恩. 必要的张力[M]. 范岱年, 纪树立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89.
- [6] 任翔, 田生湖. 范式、研究范式与方法论——教育技术学学科的视角[J]. 现代教育技术, 2012, (1).
- [7] George Ritzer. Sociology: A Multiple Paradigm Science[J].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975, (10): 156-157.
- [8] E. G. Guba, Y. S. Lincoln. Competing Paradigm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ited.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Z].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4. 105-117.
- [9] [法] 奥古斯丁·孔德. 论实证精神[M]. 黄建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29-30.
- [10]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19.
- [11] 苏国勋. 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J]. 国外社会科学, 2002, (1).
- [12] [美] 乔治·瑞泽尔. 后现代社会理论[M]. 谢立中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174.
- [13] [美] 阿巴斯·塔沙克里, 查尔斯·特德莱. 混合方法论: 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结合[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 [14] Kenneth L. Pike.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 [M]. New York: Mouton, 1954. 22.
- [15] Marvin Harris. 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M]. New York: Crowell, 1968. 571-575.
- [16]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120.
- [17] [英] 迪姆·梅. 社会研究: 问题、方法与过程(第3版)[M]. 李祖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9.
- [18] 苏国勋. 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J]. 国外社会科学, 2002, (1).
- [19] 刘少杰. 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J]. 社会学研究, 2000, (2).
- [20] 李向平, 魏扬波. 口述史研究方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2.
- [21] [美] 艾尔·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第十版)[M]. 邱泽奇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 [22] 曹锦清. 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14.
- [23] Enrico L. Quarantelli. “Can and Should Social Science Disaster Reserch Knowledge and Findings From Developed Societies be Applied in Developing Societies?” (Preliminary Paper No. 243) Photocopy. Disaster Research Center,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University of Delaware, 2006.

[24] 陶鹏,董星.灾害概念的再认识[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

[25] The Natural Hazards Center. Our History and Mission [EB/OL].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http://www.colorado.edu/hazards/about/>.

[26] 冯仕政.个案研究的表述:问题、实质与实践[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2-23.

【责任编辑:湜得】

Culture-emic constructivism: Paradigms, Ethics and Methods of Disaster Studies

LIU Hong-Xu^{1,2}, HU Rong¹

(1. Xiamen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361005;

2. 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Xianyang 712082)

Abstract: Disaster social studies is the process of collection of data and reconstructing the disastrous events by researchers who enter the sites of disasters. Taking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which is a stance of culture-emic constructivism, and integrating it with a constructionist relativist ontology and subjective epistemology, one will arrive at culture-emic constructivist paradigm.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culture-emic means connecting with the thoughts and discourses of the people in disaster areas. Constructivism can assist in reconstructing the disaster social facts and the meanings behind them. As to ethics, researchers must abide by the basic ethical requirements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maintain objectivity and neutrality without giving short shrift to humanistic empathy with the victims.

Key words: Culture-emic; constructivist paradigm; disaster studies; ethics rules; research methods